

戴先生與我

張炎元

「由鷄鵝巷洪公祠到鼓樓」

民國二十年春天，我到了南京。最初在中央軍校政訓處工作，不久之後，由於曾擴情先生介紹，認識戴先生，並參加了他所主持的情報工作。那時戴公館就在南京的鷄鵝巷，戴先生約我談話，然後有一天，我們有十個同志參加宣誓，這是最早的組織。我在鷄鵝巷公館住過一個時候，我的住室就在進門右手邊的小房子裏。我記得張袞甫兄住在我的隔壁，他主管記賬和發款，我則主管整理報告、翻譯電報和繕寫報告。房子後進有幾間房子，住着戴老太太、戴太太和戴藏宜公子他們。有位管事務的趙副官也住在一起，聽說他當過連長，個子高高的，不講究衣着。

我的房子是書記室，又是譯電室，同時也是門房。有時，戴先生也親自來到，共同翻譯電報，或斟酌報告詞句。以後徐爲彬也來了，我們共同工作。戴先生沒有指定我們誰正誰副，但我知道爲彬兄跟戴先生很熟，他們可以隨便講話，暢所欲言。所以遇有什麼問題，我總是請他去報告。那時胡宗南先生就常來，談話時我們很少參加，吃飯却常在一起。有一次意外的事發生了，是邱開基兄來訪，他和戴先生正在客廳裡談話，在客廳旁邊屋子裏的衛士，不知怎樣不小心，一時手槍失火，一粒子彈正打中開基兄的後頂上。

幸好子彈打出來時，透過房間的木板，力道弱了，所以進去不深。戴先生立刻把邱開基兄送醫院。

那時給領袖的報告，還沒有特定的格式。稿子整理好，戴先生看一遍，再由我們繕正。我們還沒有甚麼關防印信，戴先生只是以學生的名義呈給校長。這是我所記得的鷄鶩巷。

以後我被調到洪公祠，洪公祠的訓練班可以說是我們最早的訓練機構。朱世明先生、王固磐先生先後任班主任，鄭介民先生任教務課長，李士珍先生任訓育課長兼學員隊長，戴先生自己任總務課長。陳玉輝兄、岑家焯兄和我是當時的區隊長。訓練的課程，除情報⁷¹識外還有手槍射擊、汽車駕駛、照相技術、爆破技術、及人相學等。唐子長兄教手槍射擊、朱惠清兄教人相學，這批學員後來都成爲戴先生的重要幹部。

以後我又被調到鼓樓辦公室工作。這時有一個編制，上面設一位書記長，是戴先生的幕僚長，負責指導全般業務。下面分科分股辦事，我當過總務科長，也當過情報科長。梁幹喬先生把情報科業務移交給我，正當福建事變的時候，我們不但白天辦公，晚上也辦公。督察室考核同志的言行和工作，非常認真，大家都不敢隨便。以上所說，是在民國二十年到二十三年的時間，軍統局工作開創初期的情形。

戴先生完全爲效忠領袖而工作，他是一位最忠實的國民黨黨員，始終不離開國民黨的立場。開始時就是他自己一個人。他在前方，親自調查，得到資料，就自己寫好報告，呈給領袖。在鷄鶩巷，開始有少數幕僚人員，到鼓樓時，才有比較完備的編制。

軍統局的工作，由戴先生一手創造。其後在抗戰建國過程中，有輝煌的成就，因此，奠定了深厚穩固的基礎。

戴先生平日常以「創造光榮歷史，發揚清白家風」來勉勵同志。

我參加八一三抗戰

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初，南京上海情勢非常緊張，八月十一日早晨，我和梁幹喬兄兩人，送家眷去上海。梁太太帶着四個孩子，我的太太也帶了三個孩子，大女兒十歲，第二的男孩六歲，第三女孩三歲。另外還有胡天秋太太，帶着她剛生下來幾個月的兒子，三位太太，後來都到了我的故鄉梅縣。胡太太也就住在她家裡，她的兒子胡波平，和我在故鄉出生的兒子是同年，今年（三十九年）應該是三十四歲了。當時南京下關，逃難的人多，擁擠不堪，我因為服務在憲兵，得憲兵的幫助，勉強上了火車。人和行李都是從窗口裏塞進去的。我太太正在懷孕，她上車尤感困難。我們到了上海，十二號把她們送上船，當天晚上乘夜車回南京，在火車上聽到消息，說上海戰爭已爆發了。

十四日我在南京，看見木更津式日本飛機的空襲，看見我空軍和日機英勇作戰時，擊落日本的大型轟炸機。

十五日我接到戴先生自上海發給我的電報，囑速離京赴滬。十六日在上海法租界見到戴先生，要我到

京滬警備總司令部去當一個聯絡參謀，任務是搜集戰地情報。我在當時的本職是憲兵政訓處長。我到上海的第二天，便到達了京滬警備總部。司令官張治中，總部設在南翔，當時鐵路和公路交通都已中斷了，研究結果，以騎腳踏車最爲妥當，戴先生也同意了。他只是担心我腳踏車騎得不好，我告訴他，我在洪公祠就學好了，他才放心。

我除了隨身衣服外，只帶了一個小箱子，另外就是一張帆布牀和一條棉被。所有東西，綁在車後面，當天下午由公路直走南翔。初秋的氣候，天空晴朗，公路上車輛很少，人也不多。走出上海市郊不久，忽然聽見飛機聲音，就知道敵機來了，趕快下車，把車子停在路旁，自己躲在路邊水溝裏。三架敵機低飛，向馬路上掃射，一排一排的在馬路上冒出灰塵。敵機過後，我繼續騎車前進。這樣敵機來了三次，我也躲了三次，到達總部，已是黃昏的時候了。

在南翔總部住了兩星期，戴先生每天派人來拿東西。來人是王魯翹同志，他那時大約是二十歲左右，騎了一輛摩托車，總部的人都說這小傢伙長得好漂亮。因爲大家對他印象好，無形中也幫了我的忙。當時喻耀離同志也帶了一批人在戰地工作，他們是專門查拿漢奸的，我們經常碰面。以後總部遷到眞茹，總司令換了朱紹良先生，未幾，又遷到青浦，最後的司令官是張發奎先生。小地方搬了不少次，我都記不起地名了，只有一個地方在眞茹，叫徐公橋，在那裏有間學校，學校裏有位老師名葛巽齋，因對我們工作很幫忙，所以至今還記得。在這一帶前後住了五十多天，在眞茹的時候，還可以經常和上海聯繫，但到了青浦

，交通聯繫便發生困難。

我們之所以遷來遷去，爲的是避免敵機轟炸。差不多每天都有敵機在前後左右村莊轟炸，可是總部所在地，從來沒被轟炸過，真是幸運。

十月九日總部因前方情況緊急，向後方撤退。十日早上我們開始行動，當時找到了一隻小船，可以坐六七個人和行李。我們的目的地是崑山。船在小河裏行走，不僅很慢，而且一批一批的大小船隻，如同蟻聚。下午四時許，到達離崑山不遠的地方，河面漸闊，大小船隻也更多。在河裏行船一天，雖有敵機不斷的從天空飛過，但我們並沒注意，敵機也沒有低飛掃射，大家都以爲這一天可以平安渡過了。不意正在這時，我發現有三架敵機，飛得特別低，自己心中一動，懷疑他會對河裏的船隻投彈，因爲當時船隻實在太多，目標顯著，容易引起注意。乃立刻下定決心，我說鬼子飛機不對，我們上岸躲一下，船伕立刻靠岸，我們船上共六個人，大家立刻離船。飛機很快就到了頭上，果然在船羣裏投了很多炸彈。炸彈投到河裏，水花爆發，許多船隻被敵機炸得四分五裂，人和船被拋到空中，再跌落河裏，慘烈情形，使人心胆俱裂，也使人憤怒萬分。我們的船也被炸中了，敵機過後，大家到河邊去找尋行李，東西都不見了，只找到一捲鋪蓋，棉被落水，重量在百斤以上，兩個人才能抬上岸，棉被溼了，不能再用，被面被單，有炸破的洞三十多個，假使這些洞是炸在身上，準會沒有命。

我們六個人（其中一名船伕）的行李都沒有了，只好空手步行進入崑山城。崑山當天也被炸得十分殘

慘，我們到達時，已是薄暮，敵機雖沒再來，但被炸後的街道，仍有很多地方在燃燒，死傷的軍民到處可以看見。這一天是雙十節，也是我生平所過的最慘淡的雙十節。同船的一位中校參謀，名叫孫柱，安徽人，是淞滬警備司令部派在總部的聯絡參謀。他事後問我，何以知道敵機會對我們投彈？我說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感覺不對，大概所謂心血來潮就是這個道理。他說：「我們相處一個多月，我覺得你這個人有點特別，你對於來來去去的敵機空襲，好像滿不在乎。你爲什麼這樣鎮定？」我答：「這很簡單，敵機來了，假使他會炸中你，你躲也躲不了，假使你慌慌張張，就容易遭殃，反過來你鎮定一點，也許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難成祥。」孫中校後來到了重慶，勝利後又到了台灣，我還遇見過他。

我們在崑山，住在崑山圖書館，街上紛亂得很，食的都買不到。司令官張發奎和副官處長黃華南也住在二起。晚上我看見他們在一桌吃飯，黃是我中學的同學，他們飯後，我問他有沒有剩下菜飯，黃華南取來二個飯煲和一個菜盤。飯煲裏有半煲剩飯，菜盤裏也有點東西，是白菜燒魚湯，有點白菜，有一個魚頭帶魚身骨和尾。我們三個人（五個人走了兩個）每人分吃了一碗多飯，崑山十月天氣冷了，我們是用開水泡飯吃的。雖然飯菜都不够量，但吃過之後就恢復了精神。現在張發奎、黃華南先生都在香港，提起此事，他們可能忘了，但我永遠記憶，生平吃過東南西北中外筵席，但以此次半碗冷飯印象最深。

晚上我找到一間閱覽室，在閱覽室裏，我想起下午的事，河裏那麼多的船，死傷一定很多，我假使沒有上岸，也是其中之一。我又想起那殘暴的敵機，我看見炸彈由敵機下來，一個一個的，炸彈身上一條條

的白線，我都清清楚楚的記得，敵機上的飛行員戴着飛行帽，伸首到機外看下面被炸的情形，我都看得非常清楚。戰爭本來使人類變得殘忍。在戰場上殺人是自衛，不得已，但在後方對無抵抗的人民濫施轟炸，這是最野蠻的獸性行爲。

我們沒有鋪蓋，容易找到了一點稻草，我們把稻草鋪在地板上，和衣睡下，上面再蓋上稻草，稻草上面，再蓋上一本一本的線裝書。這批線裝書是很大很長的，裏頭的字也特別大，這一定是很名貴的版本。這批名貴的書，在戰爭中，可能也已被遭劫毀了。實際上天氣十分寒冷，尤其將天亮的時候，冷到打顫，無論如何也睡不着。

十月十一日我們在崑山停留了一天，晚上我們向蘇州撤退，我們什麼交通工具也沒有，只好走路，黃昏的時候上路，路上的人很多，我們整整走了一晚，天亮的時候，我們到達蘇州。

蘇州也很亂，我們找到了蘇州花園飯店，這是一間很大的旅館，可是沒有老板，也沒有夥計。我們很疲倦，找到了房間，被蓋都很完整。我們第一重要的就是睡覺，上床就睡，這一天是十月十二號。敵機輪番的在蘇州投彈。每次投彈，房屋都劇烈的震動，震動過後，知道自己沒有被炸中，繼續的睡，一直睡到下午，精神恢復了，才起身找東西吃。晚上我們乘船去鎮江，仍然是小船，但沒有受到敵機的騷擾，平靜的到了鎮江，然後乘火車到了南京。

戴先生不在南京，我見到了鄭介民先生，把一路的情形向他報告後，回到憲兵政訓處，憲兵司令部正

在往後方撤退，參謀長申聽禪先生還在那裏。政訓處還有兩位同仁沒有走，沒有車也沒有船，我們步行到蕪湖，再由蕪湖乘車經南陵貴池轉乘火輪到達武昌，這一次的工作乃告一結束。在南京時我看見大批部隊，由下關往城裏進發，但同一時候，又看見老百姓像潮水似的往下關逃走。下關江邊的行李，好像小山似的一堆一堆的排列在碼頭附近，男男女女大大小小，在碼頭上徘徊等候。我報告鄭先生說南京不能守，他問理由何在？我說新來的軍隊看見老百姓逃亡的情形，士氣受了重大影響，所以不能守。他沒有出聲，我知道他同意我的看法，但他不好講出來。我小時讀屈原的「哀郢」，記得以下幾句「皇天之不純命兮，何百姓之震愆。民離散而相失兮，方仲春而東遷。去故鄉而就遠兮，遵江夏而流亡。去終古之所居兮，今逍遙而來東。背夏浦而西思兮，哀故鄉之日遠。」在退出南京時，常常想起這些辭句，想不到三十年後，想起當日情形，更不免感慨繫之。我在漢口時晉謁戴先生，他指示我說：我們今後要準備長期作戰，他更堅定的說，我們有一天會回到南京去的。我們來台二十多年了，我們紀念戴先生，但願我們能共同努力，照戴先生說的：我們有一天會回到南京去的。

我與戴先生的最後見面

在重慶的時候，有一天，戴先生對我們少數幹部，在飯後作隨意談話。這是戴先生常常採取的一種談話方式。在他的家裏約上三五位幹部，吃一頓便飯，飯後隨便談話，可以談工作，也可以談別的，非常親

切。有時候，戴先生的話多，我們就一直聽下去。有時他問我們，我們講得很多，他也就讓我們講下去。在當時，他對於我們所提供的意見，並沒有作肯定的決定。可是，事後看他對事情的處理，可以證明，他對我們所提的意見，充份的在接受。

這一天，他談到我們團體人才缺乏的問題，他曾慨然歎息，他說：「我們團體的工作同志，中學畢業的佔大多數，大學畢業的很少，留學生更少。許多大學生不肯來參加我們的工作。」

對於這個問題，當時在坐的同志，發表了不少的意見。我對戴先生說：「關於人才缺乏的問題，是非常值得注意的。要把工作做好，必須有很多品學兼優的同志來參加我們的工作。我們現在向外面找人，只是臨時救急，並非長遠計劃。今天的大學生和留學生，在他們求學的時候，與我們並無任何關係，等到他們畢業了，我們才去找他，就是他們肯來，也不會適合我們的理想。我們應該從中學開始，選取一般品學兼優的學生，妥為聯繫指導，幫助他們的費用，使他們的學業順利進展。然後由中學而大學，在求學時，只給他們簡單的任務。等到他們畢業了，就可以吸收到團體裏來，加以運用。至於留學生，最好也由我們自己來選擇訓練。我們在平時，應該鼓勵同志，補修外國語文，每年考選若干同志，送去外國進修。同時也可以在大學畢業生中，選取若干人員，給予補助，送往國外深造。這樣造就的人才，比較更適合我們的理想。」

戴先生對上項建議非常重視。三十四年開始，在中美合作所辦理第一批出國進修人員，我本人也是其

中之一。我們在楊家山辦理出國手續，光是預防針就打了六七種之多。秋天，日本軍投降，我們這批準備出國的一羣，因勝利到來，而延緩行期。

勝利後，我回到南京，主持戰時運輸局的南京辦事處。三十五年二月，辦事處宣告結束，俞部長要我到上海去，主持上海運輸工作，我沒有去。二月二十日，戴先生要去北平。早上，他約集了在南京的高級幹部，到他住的地方去吃早點。他住在丁家橋，就在中央黨部旁邊。談話由上午八時半開始，到十一時一刻才結束。談話結束後，戴先生留我單獨談話，他住在樓上，我到了他的辦公室以後，他就問我上海去不去，如果不去，今後如何打算？我報告他，上海決定不去，原因是上海環境複雜，我對工作一點把握都沒有。如果留在南京，一時無適當工作。我寧願留在家裏，補習一點英文。

戴先生又問我，去年辦理赴美進修的同志，大部份還沒有走，他問我是否願意考慮赴美進修一個時期。在當時，對於出國進修，是大家嚮往的事，所以我當時就報告他，我願意到美國去。戴先生說：「好吧！就這樣決定，等我從北平回來，你就可以辦出國手續了。」

但是，不幸得很，三月十七日戴先生從北平經青島飛南京時，飛機在南京附近之板橋鎮山上失事。我們失去了戴先生。在對國家，在對我個人，對於戴先生之意外失事，都是創痛鉅深。我因此對美國之行作罷，我美國之行雖然不成功，但對於戴先生在南京要北上時，最後召見的懇切訓示和鼓勵，使我常常感念於心。